



针线缝出岁月长

张增宝

日子总是在不经意的翻找中，露出它最温柔的底色。

前几日，整理家中那只老旧的五斗柜，在柜子最底层的木箱里，意外撞见几双鞋垫。彩色的碎布拼接在一起，针脚虽已有些许磨损，却依旧挺括厚实。目光触碰到它们，思绪瞬间决堤——那是母亲留给我们的最细腻的温度。

母亲离开我们已经13年了，走时享年83岁。而这几双鞋垫，大抵是在她70岁前后，一针一线纳成的。

那是上个世纪，大姐一家在赤桥村忙活着童装加工的生意，家中的布料堆成了山，剩下的五颜六色的边角料，成了母亲的宝贝。

母亲是个极惜物的人。那些裁剩下的碎布，她总是细细地收拢起来，做成冬天挂在门上的门帘、小圆凳上的垫子，而最常做的，是一双双鞋垫。时光荏苒，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，这几双鞋垫，像时光的标本，被完好地珍藏至今。

每次捧起它们，记忆的闸门便轰然打开。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，妈妈在古稀之年还在为我们一针一线做鞋垫的模样。

那时，我也已经三十多岁，家境已宽裕了许多。每当我看见她又在摆弄那些碎布，总会心疼地劝她：“妈，现在条件好了，咱们去商店买几双现成的多舒服，不用再这么辛苦了。”

她总是淡淡一笑，并不听劝。只要一有空，她还是会趁着没人注意，悄悄拿出针线，慢条斯理地做起来。

母亲的眼睛已经花了很多年了。那副老花镜，还是当年赶会时在路边摊买的。她平时不戴，只有在做针线活时，才会小心翼翼地架在鼻梁上。

她纫针时，看不清小小的针眼，往往只能凭感觉，凭着几十年的经验去摸索。有时穿不进去，她便会轻轻唤我：“娃，帮娘纫个针。”

那时的我，心里装着许多琐事，总是很粗心。帮她穿好线，递到她手里，就转身去忙自己的事了。我从未想过，她戴着并不清晰的老花镜，要克服多少视物的困难，才能把那些碎布拼缝得严丝合缝，才能把那一针一线纳得如此紧密厚实。

而母亲这一辈子，之所以如此执着于针线活，背后藏着她对子女们最深沉、最讲究的爱。

她一辈子生养了我们兄弟姐妹8个。在我们年幼的岁月里，身上穿的衣服，脚上穿的布鞋，还有脚下的鞋垫，全都是她的杰作。她对自己的手艺极有要求，每一件衣物，她都想着要做到最好、最合身，要让我们穿出去感到体面、感到骄傲。

回想当年，因为我们兄弟姐妹年龄相差悬殊，哥哥姐姐有的已经参加工作，有的远赴外村、外地求学。母亲心里时刻记挂着，绝不能让外人因为衣着简陋而看不起自己的孩子。为了这一点点朴素的愿望，她会主动向村里针线活最好的妇女请教，学习新样式，琢磨新做法。

她所有的用心，所有的不辞辛苦，都是为了让她孩子们走出家门时，腰杆能挺得直一点，心里能有底气一点。

在母亲的营生里，做鞋无疑是最辛苦、最费功夫的。每一双鞋的诞生，都要经过漫长且繁琐的三道工序。

第一道工序是做“鞋样子”。她根据家里每个孩子脚的大小，用旧报纸、装化肥的纸袋，或者其他边角料的纸张，一笔一笔画出来，然后小心翼翼地裁剪整齐，分门别类压在箱底。这是做鞋的蓝图，也是她对孩子们脚的尺寸最细心的记录。

接着是做“鞋坯布”。母亲把一层纸、一层旧布仔细地黏合在一起，平整地贴在墙上晾晒。那是无数个日夜的堆叠，是为了让脚下的路，有足够厚实的支撑。

然而，最耗心血的步骤，还是做鞋底。

母亲常说，鞋底是鞋的命，做得好不好，决定了鞋耐不耐穿。她把鞋坯布一层又一层地黏合压实：天暖和穿的，底子薄一些；天冷干活穿的，就要厚一些；平日里走路穿的，适中就好。每一层都必须黏得紧实，再用大石头或重物压平，直到它们浑然一体。

画样、裁切，这还只是基础。真正的考验，是纳鞋底。

她用事先搓好的粗麻绳，配合引针，一针一针地穿透厚厚的鞋底。那不是简单的缝合，更像是一种有力的捆绑。她的手法极有规律，针脚密密麻麻、纵横交错。只有这样，鞋底才能经得起日复一日的磨损，才能陪我们走得远、走得稳。

这是一份极费体力的重活，更是个技术活。母亲常年劳作，手上布满了老茧和伤痕。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，她在纳鞋底时，偶尔会失手扎破自己的手指。鲜血渗出来，她只是习惯性地把手指放进嘴里，用力吮吮一下，擦掉血迹，便头也不抬地继续穿针引线。她从来没有娇气地喊疼、叫嚷，也不需要旁人的帮助，这点伤痛，在她心里仿佛不值一提。

母亲用一双布满伤痕却又坚韧无比的手，把深沉的爱意一点点纳进了厚实的鞋底。那鞋底上密密麻麻的针脚，是她写给子女无声的情书。

如今想来，母亲这一辈子，到底为父亲做了多少双鞋？为我们8个子女做了多少双鞋？又纳了多少双鞋垫？缝了多少件衣裳？

我想，如果母亲还健在，这个数字连她自己都记不清了。更没人能算出，她为了纳鞋底、缝衣服，扎破过多少次手指，熬过了多少个疲惫不堪的日夜，忍受了多少家务与劳作的双重重压。

我们做子女的，虽然在她的庇护下长大，却从未真正细算过这些恩情。

清明时节，细雨纷纷。我捧起这几双残存的鞋垫，睹物思人，思绪万千，便借着这些旧物，含着泪写下这篇小文，以此纪念我的母亲，也以此纪念我的父亲。感恩二老这一生无私的付出，感恩那份沉甸甸、毫无保留的爱。

愿父母在另一个世界，安好，无虞。

深夜10点，台灯是房间里唯一的明亮。我伏在摊开的作文本上，像一只搁浅的贝壳，吐不出半粒珍珠。明天就要交“我的家庭”主题征文，可我的笔尖，只洒开一团墨色的茫然。

母亲推门进来，手里是一个老旧的铁皮盒，边角的漆磨损了，露出里面深红的锈。“翻箱倒柜地找熨斗，倒把它给撞出来了。”她语气轻松，“你爸的宝贝，瞧瞧？”

盒盖开启的瞬间，一股旧纸张、干墨水和时光混合的沉静气味弥漫开来。盒中是一叠用细麻绳捆好的信，信纸脆黄，边缘被岁月啃出毛边。我解开绳子，最上面一封的抬头，是父亲年轻时笨拙而有力的字迹：“吾妻芳鉴。”我的脸蓦地一热，像无意间闯入了父母青春的河滩。

信是二十多年前写的，父亲那时在外省跑长途货运，一辆老解放卡车是他移动的家。母亲则守着故乡的晨昏与我稚嫩的啼哭。父亲的信，是他用方向盘在祖国地图上划出的思念。他写“昨夜车泊汉中，江风甚寒，想起你总说我睡觉蹬被”，写“路过一片油菜花田，黄得灼眼，忽然想起儿子的小绒帽”，也写“芳，货款被拖，这个月家用短了些，苦了你”。母亲的回信则用圆珠笔写在从小学生作业本撕下的纸上，报平安，说“儿会叫爸爸了”，说“月季新发了三枚花苞”，末了总有一句“行车万里，盼归期”。

旧信里的星河

时保进



我一行人读着，那些朴素的、甚至语法有些别扭的句子，忽然活了过来。它们是父亲在陌生旅馆灯下的哈欠，是母亲哄睡我后揉着发酸手腕的叹息。信纸的折痕处，有磨损的毛边，那是被反复展读的痕迹；某页上有几处化开的蓝，像小小的云，母亲指着它，淡淡地说：“哦，这封啊，是有一年除夕，你发高烧，我抱着你在医院走廊，边等你爸的电话边写的。大概是滴了泪，这纸不行，一沾就晕。”

那一刻，我如遭雷击。除夕——这个词在语文课上，是王安忆笔下弄堂里的饭菜香，是老舍文中北平城震天的爆竹声。而在我家的词典里，它关联的意象，竟是医院消毒水的气味、滚烫的小小额头，和信纸上这朵沉默的、蓝色的云。父亲的信，正是从那个没有他的年夜，从“吾妻芳鉴”几个字开始，变得又密又长。那些方块字，是他们用来对抗分离与困窘的砖石，一撇一捺，搭建起一个流动而坚固的家。

语文书告诉我，“家”是宝盖头下一头猪的安稳。而父母用整整一铁盒的信告诉我，“家”是“吾妻芳鉴”与“盼归期”之间，那条用思念与牵挂铺就的、最漫长的归途。它不在广厦，而在牵挂；不诉离殇，只报平安。

我轻轻合上铁盒，那声轻微的“咔哒”，像一声悠长的叹息，也像一颗心终于落回胸膛。我重新提笔，在作文本上写下第一行字：“我的家，住在一叠旧信里。”

墨迹在灯下润开，这一次，我清晰地看见，里面闪烁的，是二十年前汉中的江风，是故乡月季的初蕾，是一滴被岁月风干、却将某个汉字永远润染得丰润的，蓝色的泪。我终于懂得，最好的语文，从来不在纸上。它在母亲凝视旧信时，那突然柔软下来的嘴角；在父亲从不言爱，却将“吾妻”二字写了千百遍的、笨拙的温柔里。

我就在这样一片由最朴素的词句汇成的星河里，悄然长大。每一个字，都是一颗温暖的星子，照亮我，也照亮我将要书写的人生。

图片来源于网络网